

献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献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前 言

《献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现在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周恩来总理早在1959年倡建文史资料工作时指出：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他还号召各界人士“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

以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的文史资料，生动、具体、可读性强，有较大的感染力。它对研究近代历史，对人民进行历史知识教育，促进祖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文史资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公正地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于历史人物，不论他们的阶级地位、党派关系、政治态度、世界观和学术观点如何，只要他们在近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我们都积极征集。对于记忆有误而造成的某些史料失实，既允许读者提出质疑，也允许作者自己订正。充分尊重历史见证人从不同侧面记录的事实，允许多说并存，继续探讨。

献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特别是近百年来，涌现了许多时代风云人物，许多革命先驱站在时代前列，具有较高

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这些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亟待征集和挖掘。恳望各界人士，忠于史实，秉笔直书，积极撰写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录之于今，传之后世，激励奋进。

《献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在征集、编审过程中，承蒙有关领导、各界人士和作者的大力支持，热情帮助。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在史料核实，文字整理、编辑等方面，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政协献县委员会主席 王培仓

目 录

佩剑将军张克侠·····	郑 如
淮海战役 起义归来·····	张克侠
民族英雄马本斋传略·····	何 力
献县韩村建国县烈士塔·····	白焕宗 朱惠民 多柱山
李虎惨案·····	高凤鸣
日寇铁蹄下的华工·····	刘国强口述 申士谦整理
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汝明年事表·····	魏 星
厦门被俘记·····	高 飞
天主教献县教区	
张家庄总堂史话·····	祁永泉
天主教献县教区	
第一任华籍主教赵振声·····	泉 水
武术大师吉万山·····	高德江
多常立与中路哈哈腔·····	高良谋
纪晓岚小传·····	朱惠民
四十八村史话·····	杨新舟

佩剑将军张克侠

郑 如

电影《佩剑将军》生动地再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克侠、何基洋（二人均系中共党员），在淮海战役初期，率部起义的历史事实。

1948年10月中旬，我三野代表去徐州，向张克侠同志传达陈毅等首长指示，定于11月8日我军发起进攻时，争取两个军起义。张克侠立即介绍了当前敌情，并研究了与我军配合的具体办法。但在起义前夕，情况发生了异常变化。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对张克侠同志产生了怀疑和戒备，为了夺他的兵权，指令他住在徐州，不许前往绥靖区总部所在地贾旺。张克侠同志以果断的行动，机智地摆脱了敌参谋长、军统特务陈继淹的监视，及时赶到贾旺，与何基洋一起，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即1948年11月8日率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两万三千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这次起义，开放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道，敞开了徐州的东北防务大门，使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兵团的退路，造成了蒋军上下混乱，惊恐动摇，对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事隔三十六年，即1984年7月7日张克侠将军因病逝世于北京时，台湾《中国时报》8月8日海外版登载《叛

将张克侠病死北平》文中说：“在中共政坛，一个‘林业部付部长’地位并不高……但他在1948年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是中共取胜的关键人物……使国军无法反败为胜……。”

可见佩剑将军张克侠在淮海战役的历史作用。

张克侠将军是怎样一个人物，看过《佩剑将军》这个电影的人，只能知道他是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但却不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特别党员（秘密党员）。

为了使大家了解张克侠将军的生平事迹，这里要对他的革命事迹作个简介。

张克侠，原名张树棠，河北省献县侯陵屯村人。1900年10月7日生，少时就读于北京汇文小学、中学。1916年，他为抗议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政府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愤然投笔从戎，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23年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将军部队。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全国和广州的革命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他冲破重重风险到达广州，先后在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任少校科员兼陆军讲武学校教育付官及队长。此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我国迅速传播，他接触了不少共产党员，受到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写信对冯玉祥将军积极宣传革命道理。1925年，北伐开始，北伐军以讲武学校毕业学员为骨干，编成两个营，他担任了第一营营长。不久，冯玉祥将军领导下的西北军（北伐初期

称国民军），响应北伐，他返回西北军任学兵团团副。

1927年春至1928年秋，张克侠同志为追求光明，探索真理，在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的支持下赴苏联，在中山大学学习，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了革命觉悟，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指导革命成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工农大众推翻旧中国，建立光明的新世界。因此，渴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党员。

张克侠同志回国后，于1929年7月在上海经张存实、李翔梧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后遵照党的指示重返西北军，被任为张自忠师的参谋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克侠同志考入南京陆军大学。当时，由于日军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将领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迫切要求抗日。在我党的推动和影响下，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张克侠同志利用陆军大学放假的机会赶赴张家口支持冯玉祥将军的爱国抗日行动，并任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干部学校校长。后由于日蒋勾结，内外夹击，抗日同盟军遭受失败，张克侠同志又回到陆军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前，张克侠同志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他不但掩护我党在该军的工作，而且把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号召，做为自己在二十九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并取得党组织的同意，提出一个集结兵力、主动攻击敌人的作战方案，计划在日军增援之前，一举消灭在华北的两万日军，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

北平失陷前夕，张克侠同志获悉日军即将不战入城的重要情报，他便及时通知了刘清杨、张友渔、杨秀峰等同志，使万余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安全转移，免遭日军毒手。

“七七”事变后，张克侠同志先后担任冯玉祥将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等职。1938年又随冯玉祥将军前往武汉。在武汉期间，张克侠同志与当时的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取得联系，听取了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指示，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抗日的信心和力量，进一步理解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在特殊条件下，按照党的指示在国民党军队中积极开展抗日工作。

1938年，张克侠同志任五十九军参谋长，后任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等职。转战在山东、河南、湖北一带。他利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和与冯玉祥将军的连襟关系，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党的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方针，在国民党二十九军中各派系之间作了大量的融合工作；另一方面，他尽力创造条件，从各方面直接和间接支持掩护地方党的工作。并与新四军联系和送去医药等军需物资。在此期间，他还创办了自忠中学，进行抗日和进步思想教育，培养了不少革命、进步人才。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反共，挑动内战。掠夺抗日胜利果实，作出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将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改为第三绥靖区，张克侠将军被任命为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在新的形势面前，张克侠根据我党的指示，主动积极地第三绥靖区上层人物中开展了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阴谋的斗争。并在策划郝鹏举部起义前，亲自带郝去面见陈毅同志。

1946年夏，冯玉祥将军被迫出国“考察”，张克侠将军借机到南京送行。通过联系，受到周恩来同志的接见，接受了“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的指示。

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根据我党的指示，张克侠将军克服重重阻力，与何基沣将军一起，在贾旺、台儿庄防地率三个半师两万三千余官兵起义。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嘉勉。

张克侠将军起义后，参加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先后担任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并兼任上海淞沪警备区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50年转业到地方，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林业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森林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央林业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分党组书记等职。曾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张克侠同志是1924年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他热爱祖国，热爱党，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公开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仅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将领，而且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淮海战役起义归来

张克侠

一、策动起义

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万众欢腾，全国人民奔走相告。但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却发布命令，只许他的部队担任受降，要求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准许收缴日伪军的枪械物资及参加受降，这充分暴露出蒋介石要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的野心。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面前，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保卫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开展对敌斗争，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根据过去党给予我的指示和教导，我认为，必须利用自己的工作条件，积极进行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破坏和平阴谋的斗争。当时，33集团军奉命去信阳受降。在从鄂西驻地向信阳进军的路上，我看到了生气勃勃的新四军部队向东开去，我便和同行的何基沣坦率地进行了交谈，我表示，国共即将冲突，唯有与共产党合作，与国民党决裂才是正大光明的道路。我说要施行这一打算，首先要联系上解放军，以便能密切合作，不发生矛盾。我知道过去七十七军干训团有共产党的活动，如干训团团长过家芳就是共

产党员，于是我请何基沣派人与解放军取得联系。

到信阳不久，蒋介石为了进攻解放区，命令33集团军开往徐州集结，冯治安这时到上海去办私事，由我带队乘火车前往，途经许昌时，我去看望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我借用冯玉洋的口气对他说：要与共产党合作，不要再跟国民党走下去。刘汝明表示对共产党不摸底，有怀疑情绪，谈话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当时没有深谈下去。在郑州，我拜访了杨虎城旧部六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他当过冯玉祥汾阳军校校长，过去与我党有过联系，我们交谈比较融洽。他同意我的看法，但表示要看冯治安的态度如何。他提出“谁来领导呢？冯治安如何？他同意吗？”我到达徐州后，除寻找机会与党设法联系之外，又找了孙良诚做工作，他也是表示看冯治安的动向。

当时，徐州驻有陈大庆的部队，主持徐州工作的一位代理主任是我的同学，为了讨好蒋介石，他让我指挥33集团军的一个军，加上陈大庆的刘亿德军进攻解放区，我借口陈大庆不愿别人指挥他的队伍为由，把这件事推掉了。不久，蒋介石发布动员命令：一是将军队重新编组，二是作出了进攻部署。33集团军改为第三绥靖区，将原来的伪军郝鹏举划归第三绥靖区指挥。这个文件很重要，我让参谋抄了一份，准备送往第三野战军和陈毅将军。同时，我也看到蒋介石要把改编及未改编的伪军全部解散的一个密令，并听说蒋介石很恨郝鹏举。我认为这些对于策动郝鹏举起义，是非常重要的。

郝鹏举原在西北军，曾任冯玉祥的传令员，被送到苏联炮兵学校学习，过去和我认识。成立第三绥靖区之后，我任

副司令官，时常借视察防务和部队到他那里交谈。他对蒋介石嫡系人员对他的敲诈勒索很不满意，但又没决心反抗。我有意地把他的队伍安排在台儿庄，让其孤立在一翼，，意图使他受到解放军的影响而走向起义。

冯治安回来后，我向他分析形势，劝告他考虑今后同解放军的关系。他趾高气扬，得意忘形，认为蒋介石有几百万大军，有美国撑腰，共产党解放军不是对手。他前不久还在上海广置家财，恣情享乐，他的态度比我接触过的其他人都要恶劣，断然拒绝我的劝告。

后来，第三绥靖区司令部迁到贾旺。解放军派冯文华同志（冯玉祥的侄孙，是很早到江西苏区参加革命的）来做工作。他先找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以后又约我和何基沣一起谈，在交谈中决定不与解放军作战，解放军若进攻就让开。冯文华要回去时，因路远不安全，我表示正要去郝鹏举处，请他搭乘我的吉普车。我送走了冯文华，就到台儿庄与郝鹏举作了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我把蒋介石要将伪军解散的命令透露给他，又说明蒋介石恨透了他，必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叫他早作打算。郝哭述了他如何脱离西北军，到胡宗南那里加入了兰衣社，又如何因为内部矛盾要杀他，他没有办法才投靠了汪精卫，当上了伪淮海省省长兼第六路军总指挥。我说：“出路是有的，那就是起义投奔共产党，弃旧图新，这是唯一光明的出路。”他小声说：“解放军已派人来联系过！”又吞吞吐吐地说：“陈毅司令员约定要会晤我，时间就在今晚，这事情拿不定该如何办才好。”我即可严肃的对他指出：“这是有关一生前途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当机立断，决不可再迟疑不决。”我为了坚定他的决心，同时也为

了趁此良机送去重要文件，立即表示：“今晚一定去！我可以陪同你一起去。”他同意了。

当晚是一个阴历月底的一天晚上，天色墨黑，郝鹏举和我带着他派的二十几名骑兵，以查哨为名，一同乘马越出了警戒线。一路上，除了马蹄声和路旁树枝被碰折的响声外，周围充满紧张的沉寂。我们来到了西黄庄（村名记不大清了），有所房子周围挖有浅沟，我的马陷入沟内跌了一跤。这时，有人接应我们进入北面的房子里休息。不一会，陈毅同志和七、八位参谋人员走进屋里。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感到十分熟悉和亲切。陈毅同志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显得十分健壮有力。屋内放了一个烧木材的火盆，我们仍感很冷。但是，陈毅同志敞开衣领口，不时地擦汗，显然是匆忙赶来的。

陈毅同志讲了当前形势和解放军的政策，欢迎蒋军官兵到解放区来，并指出到解放区后一切由解放军供给。愿来者，则安之，不愿留，仍可回去。我插话说：“停战令即下，蒋介石就要收拾异己了，希望郝即刻表明态度。陈毅同志频频点头称是。郝仍是彷徨不已，态度模棱。这时，参谋人员纷纷向我探听蒋介石徐州部队番号及指挥官的姓名，我便从口袋中取出命令念给他们听。他们说来不及记录，要求我把文件借给他们看看。我说：“这就是带给你们的。”郝鹏举在旁边看见忙说：“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最后，郝答应关于起义的事再和派去的人具体商谈。

我们告别归来已是半夜，我即住在郝鹏举处以安定他。我还到郝部一位比较倾向进步的师长那里探望，他那里正有一位解放军干部（后来听说是王少庸）与他交谈，也是说服

他起义。我对他们说：“起义已基本上决定了，现在只是如何具体行动的问题。”次日早晨，我刚回到贾旺司令部，冯治安对我大发雷霆说：“冯文华来干什么？”这事不知他怎么知道的。我只装作不知不睬。

在此期间，罗炳辉同志也给我写了几封内容相同的信，大意是讲形势，劝我起义。其中有一封信落到冯治安手中，幸好信中没有暴露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冯治安把它视为一般策反的信，没有给我找什么麻烦。

过了几天，郝鹏举的副总指挥与参谋长来看冯治安，正好我也到冯那里去，他们见到我进来，只笑了一笑，没有说话。就在这天夜里，解放军进攻，郝乘机起义了。

应说明一下：郝起义后我们党对他和他的部队给予十分优厚待遇。但由于郝的反动本性未得到彻底改造，在蒋介石的引诱下，于次年（1947）又叛变革命，结果被我人民解放军消灭，郝本人被生俘。这证明反人民、反革命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冯治安在郝鹏举起义后，怕我在军中生事，就叫我去临颖整顿刚来到后方的各单位，其中有干训班，有自忠中学及一部分家属。我除了到各处看视之外，并没有其它什么事情。我住了一个多月，前方一直没有信来。忽然听说何基沣的儿子给自忠中学的同学写信，讲到我已被撤职，调为参议。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把戏。后来，冯治安来电要我返回前方。我回去后，军长刘振三告诉我：“你久不回来，所以军、师长们联名找冯治安，一定要请你回来”，因此，不让我住贾旺，要我住在徐州都天庙营房。理由是照管徐州留守的司令部各机关。冯把我和部队隔离，固然是件坏事，但另

一方面，也使我的行动比较自由，便利解放军二野及三野等方面派来的同志找我商事情。

二、再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许久以来，我热切盼望与党取得直接联系，由于这个心愿一直尚未实现，心中十分不安。1946年夏天，忽然得知冯玉祥先生要出国考察。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便以送行为借口，从徐州到达南京，住在冯玉祥的寓所。

我知道周恩来同志住在梅园，十分想见到他，可是，党的纪律和党的利益不允许我贸然前往梅园。当时，王冶秋同志在冯玉祥处工作，在同他畅谈之后，我请他代我与中共办事处联系，要求见周恩来同志，请安排一次见面。王冶秋同志把我的请求转告了党，第二天，王告诉我说：周恩来同志约我亲自面谈，由于事关重大，去梅园诸多不便，约定在次日傍晚时分，在冯玉祥寓所附近一个偏僻去处的公园外面相会，到预定时间时，周恩来同志将乘一辆黑色小汽车经过那里，要求我立即上车，谈话将在车上进行。在中国即将进行两条道路、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我能够向党组织当面汇报，又一次亲自聆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教诲，并直接接受党的具体指示，这是多么珍贵，多么令人感到幸福的啊！

我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等到傍晚，便穿着军便服约会王冶秋同志，装着散步的样子走向指定地点。这里很僻静，附近见不到什么人。约定的时间到了，一辆黑色小汽车准时开到，在我们跟前停住。车门打开，我看见久别渴望的周恩来同志身穿中山装，镇静地坐在后座向我点头。我跨进去刚坐在他身旁，汽车便迅速开动前进。在向前行驶的时候，周恩来同

志仔细地透过后面的车窗观察，看到没有盯梢的车子，便向我亲切问候。车上除司机外，还有一名警卫员坐在司机旁边。我立即汇报了徐州地区的情况。周恩来同志时而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时而沉思点头。我向周恩来同志谈到今后工作和组织起义的问题后，他指示我，“现在，要多向蒋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打。我们不但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去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我表示：我所在的部队和我相处很久，彼此均很熟悉和信任，在作战中，他们肯定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起义是有条件的。只要党下令，我可以保证随时起义。我告诉周恩来同志，在部队中的斗争很复杂，有不少反动的国民党军官，还有一批特工人员，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为预防敌人的破坏，请求解放军在进攻前派联络人员到我那里去，以便很好的配合。周恩来同志表示赞同的点点头，他沉思片刻，环视四周，又看看表，忽然紧紧握住我的手摇动起来。我明白了，这次谈话必须结束了。在我面前这位卓越党的领导人肩上，有无数的重要担子要承担，有无数的事情等待他急迫料理。他日理万机，不分巨细，正当国民党反动派气焰正在嚣张的时候，还不避风险的在国民党首都的南京街道上，从容不迫地做出了打击敌人的指示，这是何等令人惊奇赞叹的壮举啊！尽管我还有许多话要说要问，但是为了迎接光明与黑暗的决战，我已不能再同他坐在一起，偎靠在他身边了。

汽车在一个僻静的地点停下，当我迅速下车后，汽车立即疾驶而去。顷刻便消逝在旧中国沉闷的夜色之中。

次日，王冶秋同志到梅园办事处去，回来对我传达了董必武同志的指示：在车上的谈话很重要，很有价值，但当时干扰太多，还有一些问题不十分清楚，最好写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我遵照董老的意见，把徐州敌人布防情况和我的要求，写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材料，转交给周恩来同志。

在同周恩来同志会晤前，王冶秋同志曾提到：有人谈论李济深正在南京搞“第三路线”，策划反蒋，邀我前去会面。我与李见面时，他向我谈了反蒋打算，希望我和他合作。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时，也谈到了这件事。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在党的领导下行动。

三、“守备”徐州

我带着周恩来同志和党的新指示赶回徐州。回来之后，再一次积极开展对冯治安的争取工作。我到贾旺找他，又借口冯玉祥的临别赠言，耐心地希望他认清形势，站在人民的一边，冯治安对蒋介石抱有很大的幻想，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和解放军能够取胜，也舍不得他的财产和小老婆，态度还是很顽固的。但是，我仍然不放弃对他的争取，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认真考虑我的建议（信的底稿竟仍存留至今）。

冯治安与我多年相处，他总以为他是带兵的，我没有兵权，他不说话，谁也带不走他的部队。为此，他认为只要把我和部队隔离开，我就成不了什么大事，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因此，他坚决反对起义，但又顾虑我在多方面的威信与影响，也就没有对我立下毒手。